

主编·李子云
赵长天
陈思和



捧血者

陈梦熊编

世纪的
回响·
作品卷

辛 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捧血者/辛 劳著

ISBN7—80607—175—X

I. 捧…

II. 辛…

III. 诗文—作品—中国

IV. I226/266

捧血者

©辛 劳著

责任编辑:成 平 田中全

装帧设计:王震坤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电 话:3331403 邮政编码:519015

印 刷:中国人民解放军 7219 工厂

开 本:850×1168mm

印 张:7 字数:150 千

版 次: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0 册

ISBN7—80607—175—X/1·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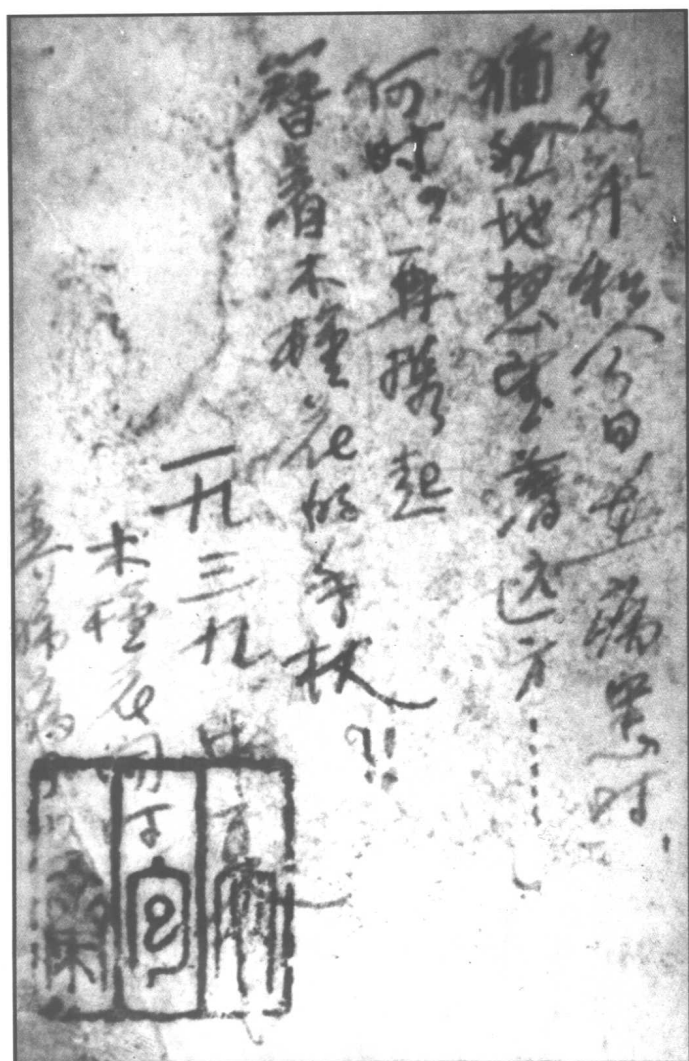
定 价: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退厂包换)



勞 亭



辛 劳手迹

编辑说明

一、近年来学术出版界虽已注意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不同流派的作品和理论主张,但仍有一些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产生过影响或别具一格的作家或作品,由于种种原因,或未被发掘,或作品虽经重印,但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为反映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历史全貌,我们特编选这套丛书出版;

二、本丛书按照文章类别,分辑出版,每辑十本,第一辑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第二辑以文学评论为主,以后将陆续编辑出版以美学、文化争论等方面为主的学术文章。每书有一书名,体现该作家作品的风格面貌,另有一副题,标明作家、批评家或文化群体名称。每书的体例,分总序、本书序、正文及编后记。编后记说明编选者的尺度;

三、本丛书所选文章,一律采用初版本或最初发表于报刊的原始文字。为保持作品的历史风貌,有些作者惯用的语言、某些观点,虽与今天的有所不同,我们仍保持原貌,不作改动;

四、由于人力和编者学识的限制,编选中如有重要疏漏和错误,望行家和读者指正,以期改正。

HG01/05

《世纪的回响》丛书序

钱谷融

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诞生到今天已经走过了将近八十年头，在滚滚向前的历史长河中，八十年不过是一转眼的工夫。我们中国又是个文明古国，从《诗经》算起，我们的文学已经有三千年的光辉历史，八十年的成就，决不能与三千年相提并论。可是，就在这短短的八十年中，我们却也产生了像鲁迅这样的即使站在屈原、杜甫、曹雪芹等中国最伟大作家的行列里也无愧色的人物。世界各国文学的历史告诉我们，在每一位伟大的作家的周围，在这位作家的影响和带动下，往往会同时出现各种各样的作家群体。尽管他们的才能有高下，成就有大小；就创作风格而论，也既有与这位大作家相近似的，也有与这位大作家显然异趣的。在他们的共同参与下，形成了一个繁荣昌盛的局面，就像我们的三、四十年代那样，因为有了鲁迅，就使文学的天空一时显得群星璀璨，光辉夺目。至今回顾起来，犹令人不胜神往。

当然，历史上的任何一种繁荣昌盛的局面，总是难以长盛不衰的。中国二、三十年代文学的兴旺景象，后来也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而消歇了。此后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后，也由于整个时代环境的种种特殊条件，这种兴旺景象在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到来之前，始终未能重新出现。但是，认真严肃的作家，忠诚献身于文学事业的作家，不管在怎样艰苦的条件下，总是在默默耕耘的作家，应该是代不乏人、始终存在的。因而值得一读的、能够传之久远的好作品，相信总也是不绝如缕，不会长久中断的；不过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暂时隐没无闻，不为人所知，有待于热心人的发现，甚至得花些力气去进行发掘罢了。可能还会有这样的情形，一些原来相当受人欢迎、而且确实值得一读的作品，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忽然销声匿迹，不再出现了。遂使一大批比作品晚出世的年轻人，就根本不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些作品的存在。大家只要回头想一想，在新时期到来之前，像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的作品，不是几乎完全被人们遗忘了吗？

解放前，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内容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以及评论等文学的各个门类，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起到一九四九年四月止，历时十四年之久，一共出了十集，每集十六本，总计一百六十一本（其中有一集十一本），共收入八十六位作家的作品。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与现代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影响极其深远。巴金在《文学丛刊》第一集出版时所写的《编者的话》中说：“我们这部小小的丛书，虽然包括文学的各部门，但是作者既非金字招牌的名家，编者也不是文坛上的闻人。不过我们可以向读者担保的，就是这丛刊里面没有一本使读者读了一遍就不要再读的书。”就是说，这套丛书唯一依靠的是作品本身的价值，决不凭藉作品以外的力量来招揽顾客。话又说得很谦虚，只说这些作品决不是读了一遍就不想再读的书（其实这已很够了）。事实上这些作品出版以后，备受读者的欢迎，都是一版再版，最多的重印达十几次之多，最少的也都印了三版。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作品解放以后都没有能够重

印，遂使一大批作品连同它们作者的名字（特别是一些不属于左翼的作家）渐渐的被人们忘怀了。至于一些四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大学文科学生），则根本不知道曾经有过这些作品和作家的存在。一部现代文学史显得异常纯正而又单薄，这既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从国民教育方面着眼，也使广大人民失去了许多可以吸取的有益的精神营养。这是很不明智的。

我们有鉴于此，在二十世纪即将与我们告别的时候，决定对将近八十年的现代文学的历史，作一次巡视式的回顾，将一些长期被人们所忽视、甚至有意加以排斥的作品，只要它们艺术上有特色、内容又确有可取之处，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以及具有学术价值的文艺评论，收集起来，以丛书的形式，按类分辑加以出版。十本为一辑，辑数暂不规定，看以后的实际情况再定。准备每年出版一至二辑。我们并不认为我们加以重印的作品，都是能够风行天下、传之久远的精品杰作。一部作品能不能受到读者的欢迎爱好，除了取决于这部作品的思想价值、艺术质量以外，还有种种其他因素，甚至一些偶然出现的特殊机缘，也会严重影响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的命运。就说读者的审美心理吧，也从来就不是稳定不变的，它常常会受到种种现实条件的左右和制约。譬如社会风气，时代好尚等等。上面所说的一些作品之所以会在过去受到冷落或排挤，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文学史上的许多大作家，在当时并不一定能得到大家的公认，人们对之常是或褒或贬，毁誉不一的。即使是他们死后，虽已盖棺，围绕他们的争论仍未止息，他们的声誉地位，仍会有或升或降，忽沉忽浮的变动。往往要经过时间老人上百年的淘洗、鉴别，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才会逐渐牢固地确立起来。当然，进行筛选和淘洗，首先必须让人能够更多地阅读和了解那一时代的作家作品，但有些作品现已难找到，即使是一些开始受到重视的

作家的某些方面也往往受到忽视。这种状况造成客观评价的障碍，因而我们将一些有创作个性而即将湮没的作家和一些知名作家被人忽视的作品编选出版。我们不敢说我们的艺术眼光是最可靠的，但我们至少知道作家与作品是各种各样的，读者的兴趣爱好也是各种各样的。因此我们认为在艺术上还是采取宽容态度为好，应该容许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存在。我们决不因为自己喜欢玫瑰花，就反对人们去喜欢紫罗兰。我们只坚持一点，我们向读者推荐的，都是我们认为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可取之处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或在某一时期曾发生过较大影响，反映了某种创作思潮或思想观点，或者对于某位作家来说，它们代表了他创作风格的不同侧面，我们决不敢把一些艺术的赝品来浪费读者的宝贵时间。我们的目的除了认为应该给一些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作过贡献的作家作品，恢复他们应有的地位，以充实、丰富现代文学史的原有面貌，同时也可以使青年作家在创作时有所取资与借鉴，进一步促进我们创作的繁荣。再说，这些作品既是从中国的现实土壤上、从人民的生活中、心灵中产生出来的，那么它们在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提高国民的素质方面一定能够发挥它应有的积极作用。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够得到各方面的支持，时时给我们提出批评和建议，使我们的工作能够做得好一些。

一九九六年六月十四日

序

王元化

我认识辛劳是在抗战初，那时我刚刚从北平流亡到上海，还是一个读高中的十七岁的青年。我在上海参加了平津流亡同学会，做一些联系文艺界的工作。记得一九三八年的一个春天，我带着一封介绍信，到马斯南路（今思南路）一家难民收容所去见辛劳，准备请他到平津流亡同学会去谈谈文学创作问题。他在那里负责难民的文教工作。马斯南路是法租界一条幽静整齐的马路，平时车辆不多，在并不宽敞的柏油路边，栽着两排望不见尽头的梧桐，树上布满绿色的嫩叶。收容所是用竹子和木板搭成的简便房屋，虽粗陋，但清洁，一切都井然有序。室内有几个青年人，其中一个看见我，向我走来。我说明来意，他没有作声，只是用一双湿漉漉的鹰眼注视我，要我跟着他走。经过了两三间屋子，他才停下来，还是不作声，盯着我看。直到我把信交给他，说明要找辛劳先生，他才用几个简单的字说我要找的就是他。这时我才注意到他的外貌。他有一张狭长的脸，一头蓬乱的卷发，穿着一件叫做“乌克兰衫”的俄罗斯农民服式的上衣。这身打扮很特别，他给我的头一个印象并不好，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罗曼蒂克气息。他谢绝了演讲的邀请，但为我写

了一张便条，要我改请别人。后来我发现他给人的最初印象几乎都是不好的。他不仅口吃，也不善于讲话。他的大舌头发音含混，加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不强，往往不能把自己的意思完全说明白。他总喜欢盯着人看，好像要在你身上发掘什么可疑的东西。这种对人逼视的习惯，使人感到不舒服。那时他比我要大八、九岁，但我觉得他并不比我成熟。我在收容所一见到他，就感到他在模仿普希金，他的样子也确实有点像。我不知道他的卷发是天然的，我还以为这是刻意的模仿。

在这以后不久，辛劳有时也到平津流亡同学会来坐坐了。他还为我们办的小刊物写一两首小诗，但我们并不欣赏他写的诗。记得他第一次拿来的两首，其中一首题名是《发霉的鼻子》。这首诗仅有七、八行。我觉得诗的题目显然是套用涅克拉索夫的《严寒·通红的鼻子》。涅克拉索夫这首长诗我读过，我很喜欢他的沉郁风格。其中所描写的那个在荒野森林中踉跄前进后来迷失在茫茫风雪中的农妇，使我从一个平凡质朴的女性身上看到了崇高和伟大。但辛劳的诗显示了什么境界呢？我觉得他的诗缺乏意境也缺乏语言的美。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在平津流亡同学会负责的一位燕大同学，是个政治性很强的人，常常用小说《毁灭》中的美谛克去嘲笑一些知识分子。但他也读了不少文艺作品，特别是罗曼罗兰的作品。他从辛劳交来的另一首诗中挑出“唱出心弦”这样的句子，以不屑的口气批评道，为什么不说是“弹出心弦”呢？那时我周围一些人就是这样看辛劳的。我对辛劳有了较多的理解，并对他写的诗和散文由发生兴趣而喜爱是在这以后的事。辛劳在一九三八年下半年就带领收容所的一批青年难民到皖南新四军去了。渐渐由那里传来消息说，辛劳去后心情并不舒畅，似乎身体也不好，在咯血了。可是详细的情况究竟怎样，孤岛上的朋友谁也说不清楚。直到今天我对当

时不少文化人在皖南的遭遇才算有了一些了解。我以为这是基于农民意识的反智主义。其实早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就已经有了这种迹象，土地革命时期也出现过“打倒知识分子”的口号。

一九三九年初我随上海慰问团到了皖南新四军军部，在服务团时，我被安排住在辛劳那个单独院落里。辛劳曾在他后来出版的散文集《古屋》中描写过它。这个院落很小，只有几间屋子。一进院门，左右各有一间，辛劳住一间，另一间是聂绀弩住的。我去的时候，绀弩出差到金华了，要过一阵才回来。辛劳不知道我会来，一见到我，显得十分高兴。那时他因咯血，没有做什么工作，一人独处，感到相当孤独。这段日子我和他朝夕相聚，比在上海时熟悉多了。最初我们在谈到文艺问题时，曾发生过相当激烈的争论。争论的问题现在已经记不得了，不过我可以说，当时他对文艺的理解要比我深刻得多。我受到由日本传入的苏联文艺理论的影响，在不少观点上有机械论倾向。我们争论时，都动了感情，两个人全拉长了脸，谁也不理谁。可是这次争论只是成了我们日后友谊的一个曲折的前奏。次日我们又重归于好，一天的乌云消散了。我们在感情上迅速接近起来。辛劳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他不轻易放弃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他告诉我他到了这里后，由于读《红楼梦》，遭到了不少嘲笑和批评，对此他一直想不通。更使他感到痛苦的是和他一起来的女朋友，发现他到了根据地并不像她所想的那样显示自己的革命才能，相反在许多方面倒成为被人指摘的目标，而对他的态度完全改变了。她调到另一个地方，几乎完全和他断绝了音讯。一天当我要到她所在地去的时候，辛劳要我带一封信给她。我把信设法转给她，但并没有得到什么回应，这事就这样徒劳无功地结束了。

我在服务团的那些日子，最使我难忘的是辛劳把他写的长诗《捧血者》拿给我看。这首诗刚完成不久，他经过了反复修改。我还

看到修改前的初稿，我把两者对勘，发现初稿许多地方已大段大段地被砍去了。还有不少段落后来留下来的只有寥寥几行。辛劳把他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在这首长诗上。在当时那样的环境里没有人会像他那样去做的。他对文学的不顾一切的执著，真是使人感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至今我还记得他为我朗诵自己诗歌时的情景。他的脸因为兴奋而发红，眼睛闪耀着灼热的光，两片薄薄的嘴唇微微发抖，声音在震颤。……这时你不由得会对他产生好感。后来我读到吴强回忆皖南的文章，他说辛劳为他和聂绀弩等朗诵《捧血者》时，常常被听的人所发出的赞叹打断。我不懂诗，也没有写过一首新诗。读了《捧血者》后，我开始读辛劳的诗，我变得很喜欢辛劳的诗了。我被辛劳的诗所感染，领会到了辛劳诗中的真情至性，它的感情波澜和思绪的起伏回荡。但是那时我还不能用明白的语言说出我的感受，虽然我确实感到了它们，自然我也有不理解的地方。看出辛劳诗的真正价值的是绀弩。他们两人在服务团那个小院落里比邻而居的时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是不久绀弩调离了皖南。辛劳写了一首送别诗，记述两人在小河口离别的情景。辛劳伫立在河边，望着船夫将竹篙插入水里，渡船缓缓地离开了岸。绀弩站在船头，马儿依在身旁。他低着头，没有向岸边看，渡船渐渐远去……这首诗里充满了诗人的深情。从皖南回来后，我读辛劳的诗，越读得多就越觉得他是一个最不会掩饰自己真性情的人。诗人需要这样的性格，但要用同样的态度处世就未免不合时宜了。这使我感到，我刚认识辛劳时对他所产生的不好印象就是由这样的性格所引起的。如果他懂一些世故，懂一些人情，情况就可能会两样了。但是，他不懂，也许他是懂的，但偏偏不愿照世俗行为去做。

发生在辛劳身上的这类事是很多的。孤岛局面结束以前，辛劳曾经从新四军回到上海。他在上海的生活很艰苦。一次正当上海

的汛期，连下了几天暴雨，街道都被积水湮没了。夏天是酷热的，有好几天我因为大水没有出门。突然辛劳走上三楼推门进来了。他向我说，关在家里实在闷不过，所以用手中最后一点钱叫了一辆三轮车，涉水到我家来。他在上海很少和人接触，见到我特别感到高兴。但我觉得他太由着自己的性子了。难道不会等几天再来？他如果坐电车来看我只要几分钱就够了。这天他谈得很兴奋，谈话的内容已经回忆不起来了，只记得他说在这些日子里常常挨饿。他竟把饿的感觉，一一记下来，写下了三十来条。后来他还把这稿子给我看过。他在回到上海的时期，全靠投稿拿点稿费过活。这天他对我说稿费用光了，新投的稿子一时还拿不到稿费。他有几天没有吃肉了，很想吃炸大排，问我有没有钱。那时我用的是家里的钱，我掏出身上所有的五块钱，他高高兴兴地拿走了。在我们的来往中，这是很平常的事，朋友之间有无相济。谁有谁拿出来，没有的向有的人去要，谁也不把这当回事。但是辛劳对我家里的人也不讲一点礼貌，没有一句客气话，也一视同仁地照旧白着他那双目光尖锐湿漉漉的眼睛盯着人看，这使他们有些不舒服，就像他最初用这种不礼貌的眼光引起我的不快一样。不过辛劳全不理睬这些，仍旧我行我素。

辛劳在上海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渐渐多起来，他也有一两本书出版了。他的才能终于得到了承认，但主要是在孤岛范围内，而且还只限于孤岛文学界的狭小圈子里，社会还是不知道他。当我今天回顾孤岛文学的时候，我要说在我们这些从事文学写作的朋友中间，辛劳是最有文学才能的。我说的才能是指一种艺术感受，即对大自然、社会世态和人类心灵，往往体会到一般人所未见、或虽然见到却被忽视的方面。作者在表现这些体会时，自然而然地注入了自己的个性特征，从而使自己的作品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特有情

趣。在这方面,我认为当时我们中间是没有人可以和他相匹敌的。辛劳的作品不一定写得深刻,但却是独创性的,总带着性格的烙印。虽然他的诗歌和散文有时也不免留下那个时代的某种模式的痕迹,但在朋友之中我敢说在当时他是唯一能够摆脱教条束缚的人。他在创作的时候不能忍受斫伤个性或违反自己的艺术感受的事发生。一次他写了一首题名《土地》的长诗投给《奔流》文艺丛刊,当时负责编务的是蒋天佐。诗在《奔流》第一辑上发表了。我读了很喜欢这首诗,认为在辛劳的诗歌中堪称佳作。《奔流》出版后在满涛家里开了一个小规模座谈会。大家谈得正高兴,辛劳发言了,他说天佐修改他的诗并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他对此有看法。辛劳突如其来的发言,使空气立刻变得严肃起来。天佐忙解释说,他很喜欢这首诗,他动手修改是为了使这首诗更好,但天佐的说明并不使辛劳满意。过了几天,辛劳来看我,他仍对此事感到不快,他对我说:“我写的是我的家乡和我对家乡的感情、感受。我家乡出葡萄酒,天佐却把它改成了酸米酒,可是我家乡并不出酸米酒怎么办?”当时延安正提出了“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大后方也正在进行民族形式问题讨论。辛劳举出的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天佐删改的原则分明是觉得葡萄酒不如酸米酒民族化。当时我是同情辛劳的,在开座谈会时,我还不清楚事情经过,没有为他辩护,别人也都没有说过一句话,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倒是辛劳本人不久以后,在《新文丛》上发表了一篇《树和剪树的工人》(《旅客及其他》中的一节),作为对此事的回答。这是一篇散文,也是一篇艺术性的批评,深刻,尖锐,却丝毫没有意气用事的意味。虽然他在真理问题上决不假借,坚持自己的主张,但他是以平心静气的态度提出自己意见的。这类争论文章就像他的创作一样,显示了他的气质。这不是可以学到的。我不知天佐看了这篇文字后有什么感想,倘他不把个人的自尊放在文学

的真理之上，我相信他对辛劳的批评也会折服。辛劳去皖南后是他创作的旺盛时期，这时期他一直在生病。病的阴影总和他的作品相伴随。病给他带来痛苦，使他的作品显得病态，但同时也磨炼了他的诗才，使他沉静下去，感情内敛，想得更深，感受得更多、更细。这真是不幸的幸事，我不知道天地究竟是爱才，还是忌才？既然赋予这个人以过人的才华，为什么又偏偏要将众多的不幸降在他的头上？

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全部沦于敌伪之手，从此辛劳再没有回到上海来。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他临去苏北前来向我告别。那次他从我家拿走了一只手提箱，这是邢秉枢（后改名林修德）去苏北时放在我处的，解放后邢要我把这只箱子和里面的几件衣服还给他，我已还不出。辛劳去世的年月当时就没有人知道。抗战后不久我听淡秋说，大约一胜利，辛劳就从苏北回来，经过韩德勤驻地，被捉去杀害了，那时他才三十多岁。辛劳被害的详细经过虽经多方打听，但始终不清楚。他活得寂寞，也死得寂寞。我还记得他在世时，一次从新四军回到上海，我去看他，他正在害病，一个人孤零零躺在床上，面孔削瘦，不住呛咳着，他抬起眼睛望着我说：“今天是我三十岁生日。”这眼光这神情使我至今难忘……现在辛劳的名字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很少有人记得了。他的作品长久没有重印。各种现代文学大系都没有选入他的作品，现代文学史也没有提到过他的事迹，难道他真的将永沉于文学的忘川之中？我希望这本《〈捧血者〉及其他》能够唤起人们对他作出公正的评价。

一九九六年六月三十日

补记：

本文发表后，报馆转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王春瑜先生给我的来信。信中说：“……我藏有阿英先生在盐城抗日根据地编的

《新知识》二本，其中一九四四年出版的一册上，载有阿英亲自写的书讯，现将此页复印寄上。由此可知辛劳还有《栅栏草》，也可断定他被韩德勤抓去，也并非是在抗战之后。……”这封信可纠正辛劳于抗战后被抓去遇害这一说法之误。信中附来复制剪报，题名《华中根据地出版书录》，署名“英”。这篇简讯共三则，最后一则标题为《栅栏草》，其文如下：“辛劳著。诗集。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刊。收诗四篇：‘在月夜’、‘五月十四日’、‘小夜曲’及‘插秧女’。皆作者在韩德勤省府狱中作。油印本。”

同年九月二十日